

对《馬克思主义者 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羣众 运动》一文的批語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看一看，是我的几段話和列寧的几段話，題目叫做《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門迫击炮。向着庐山會議中的右派朋友們，乒乓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連珠炮彈。共产党內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听见炮声了嗎？打中了你們的要害沒有呢？你們是不愿意听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橫獨行”，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弯”；“一轉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当做大魚釣出来”而且“有些象鐵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讲话的資格，簡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們出来才能收拾残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

伙，你們那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話呢？但是據說你們都是头号的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經驗，多讲缺点，少讲成績，总路綫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寧怎么評論巴黎公社，列寧又怎样評論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那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較，是那一个好一点呢？还有，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中國建設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列寧写的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較，那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見列寧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諾夫，批判那些“資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資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們”呢？如未看見，请看一看好嗎？

“对轉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緒，宣传开倒車——这一切是資产阶级知識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騙的。”怎么样？我們的右翼朋友們。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們，都爱好馬列主义，那么，我建議：将这个集体文件提供全党討論一次。我想他們大概不会反对吧？

对《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和《目前农村中閑話較多的是那些人》二文的批語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将这四篇印发各同志。請各省、市、区党委負責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以介绍。請各級党委予以研究，有那些經驗是可以采納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納的。一条，勤俭办社；第二条，多养猪（不养猪的同族除外）；第三条，增殖大牲畜；第四条，增加大农具；第五条，食堂办法；第六条，工作踏实，实事求是；第七条，有事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很好的。我想，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得較好的同王国藩那样的公社，請同志們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目前农村中讲閑話較多的是那些人？》，这一篇也值得一看。这些与目前在庐山讲閑話較多的人們是有联系的。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右傾机会主义者为什么現在发动进攻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犯右傾机会主义錯誤的同志，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會議上提出意見，更不在北戴河會議上对高指标提出意見，也不在去年十一月武昌會議上提出意見，也不在今年一月北京會議上提出意見，也不在二月郑州會議上提出意見，也不在三月底、四月初上海會議上提出意見，而在这次庐山會議上提出意見。

这些同志为什么不在那时候提，而在这个时候提？因为他們的一套，那时提不出。如果他們有一套正确的見解，比我們的高明，在北戴河就提嘛！他們等到中央把問題解决了，或者大部解决了，才来提，认为这时不提就不好提了。因为他们感覺現在不提，再等几个月以后，形势要好轉，时机过了，就更不好了，故急于发动。

关于枚乘“七发”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讀。这是騷体流裔，而又有創发。騷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踞上游。宋玉、景差、賈宣、枚乘略逊一等，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發”的氣氛，不是有頗多的批判色彩嗎？“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一开头就痛罵上层統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輿入轂，命曰蹶淒之机。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膾，命曰腐腸之藥”。这些話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現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識分子，党、政、軍工作人員，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說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足干劲，反右傾。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脉淫濯，于是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后。往来游讌，纵姿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滯、永久，而不廢。虽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說，有些象我們的办法，对犯錯誤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煩

关于枚乘“七发”

93

意乱，坐臥不宁。这样以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傾或“左”傾机会主义这种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滯、永久而不廢。”这个法子，我們叫做“批判从严”。“客曰：今如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針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題思想。此文前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說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題之反面。文好，广陵观湖一段，达到了高峯。第九段是結論，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涖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說服而不是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見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象我們的“处理从寬”。首尾两段是主題，必讀。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讀。我們应当讀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諾夫、斯大林、李大釗、魯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說公要社之原因，兼談政治挂帥的极端重要性，馬克思“覽觀”，列寧“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讀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見故人。聊效野人獻曝之誠，贈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較低的阶层，有一条爭上游，鼓干勁的路綫，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讲的，不是如同我們現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資產两个对抗阶级說的。我們的爭上游，鼓干勁的路綫，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种洩气、悲观、靡烂、右傾上层統治的人們。我們現在也正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吳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給吳国貴族們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沒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詞，跟屈、宋、賈、枚唱反調，索然无味了。

給詩刊編輯的一封信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

×××、××二位同志：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改。如以为可，可上詩特刊。

近月右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說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他們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脈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雞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們越罵得凶，我就越高兴。讓他們罵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誰敗誰勝？我这两首詩，（註：指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和五九年七月一日登庐山所作七律）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对彭德怀九月九日的信的批示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此件印发各級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軍事、外事會議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場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誠恳的。倘从此彻底轉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議，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錯誤，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們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錯誤的同志，只要他們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們。必須坚信，我們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計在內。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工作分配的建議，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讀几年書极好。年紀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時間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調查、研究工作，則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附录：

彭德怀的信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已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恳切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三十多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作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 外事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

……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了会的，批判了这个东西。因为都是共产党组织，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个集团来破坏那一个集团，这是不许可的。我们不许可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组织，挑起一部分人来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们也不许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拨。……

我现在劝一劝犯错误的几位同志，你们要准备听闲话。我曾经劝过别人，比如罗炳辉同志，他那个时期犯过错误，他发非常大的脾气，我后来劝他：你不要发脾气，你是犯了错误，你让人家讲，让人家讲到不想讲的时候。他不想讲的原因，就是你改正了。你对人家好，对自己的错误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人家为什么要讲呢？他就不讲了。现在犯错误的同志，我劝你们要准备听闲话。一提起你们犯错误，不要触目惊心，准备人家讲你几年。我说长也不会，看你们改的情况，如果改得快，几个月就不讲了，改得慢，几年就不讲了，只要改，快慢都可以。要诚恳对人，不要讲假话，要老老实实，讲老实话。我劝犯错误的同志，你们要靠拢大多

数，要跟大多数合作，不要只跟你們气味相投的少数合作。如果你們能实行这两条：第一能够听閑話，准备听，硬着头皮，你讲我就听，說你讲的对呀！我就是犯了那个錯誤呀！阿Q这个人是有缺点的，缺点就是表現在他那个头不那么漂亮，是个癫痫头。因为他就是讲不得，人家偏要讲，一讲他就发火。比如那个癫痫头就发光也讲不得，說光了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作者描写一个不觉悟的純朴的农民。阿Q是个好人，他并不組織宗派，但是那个人不觉悟，他是讲不得缺点。他沒有主动。你沒有主动，人家偏要讲，一讲就发火，发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贏，他就說儿子打老子。人家說：阿Q！你要我不打你，你就讲个老子打儿子，我就不打你了。好，老子打儿子。等到打他的人走了，他就說儿子打老子，他又神气起来了。犯錯誤的同志要准备听閑話，多准备听一点。要对人老实誠恳，对人不讲假話。再一个要靠攏大多数。只要有了这几条，我看是一定会改过来的，否則就改不过来。如果是閑話也听不得，对人不誠恳，讲假話，又不靠攏大多数，那就难了。“人非圣賢，孰能无过”其实这个話也不恰当。圣人也是有过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蝕也。其过也，人皆見之，其更也，人皆仰之。”我們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就是凡人多多少少、大大小小都要犯一点錯誤啊！犯錯誤不要紧，不要把錯誤当成一个包袱，了不起，只要改。“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蝕也”。好象天狗吃掉太阳月亮一样，犯錯誤，人家都看見，如果改了，人皆仰之。

我們要学点东西，要学习馬列主义。×××提出学习任务我非常贊成，这包括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学。時間不够怎

么办？時間不足可以挤時間、問題是要养成学习的习惯，就能学下去。我这个話首先是对犯錯誤的同志說的。第二是对我們所有的同志（包括我在內）。許多东西我沒有学。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馬克思主義各部分的學問我沒有学好。比如說外国文，也沒有学好。經濟工作到現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同志們，我决心学习，至死方休，死了拉倒！总而言之，活一天就学一天，我們大家一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环境，我想我也学一点，不然見马克思的时候，我很难受。他出一些問題一問，我答不出来怎么办？他对中国革命的各种事情一定感兴趣。还有自然科学也很不行的，技术科学也不行。現在学的东西很多，怎么办呢？还是一样一样、多多少少学一点，钻一点，我說下了决心，一定可以学，不管年紀大小。我举个例子，游泳我是一九五四年才学好的，从前就沒有学好。一九五四年清华大学有一个室內游泳池，每个晚上去，戴个口罩，化装，三个月不间断，我就把水的脾气研究了。水它是不淹死人的呀！水怕人，不是人怕水，当然也有些例外存在，但是凡水該是可游的，这是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是水，因此武汉长江是可以游泳的。我就駁斥了那些同志反对我游长江的，我說你們形式邏輯都沒有学。凡是水都是可以游的，除若干情况之外，比如說一寸之水就不能游，結了冰就不能游，有漩渦的地方不能游；有漩渦的地方（如长江三峡）也不能游。除若干情况外，凡水該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由实践得来的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是水，結論就是武汉长江是可游的。比如汨罗江、珠江是水，是可游的，北戴河是可游的。它不是水嗎？凡水該是可游的。这是个大前提，除了

一寸之水不可游，一百多溫度之水不可游，零下之水結了冰不可游，有鯊魚不可游，有漩渦不可游，除此之外，凡水都是可游的，这是个真理。你不信嗎？下了決心，只要有意志，我看萬事都是可以做成功的。我勸同志們學習。最近，我們看了天安門大禮堂，嘍，那可有點文章呀！你們去看一回好不好？（全場高聲回答：好！）叫萬里同志講一講，他這個人姓萬么！一天要跑一萬里。只有十個月，許多人說不信，請來的蘇聯專家說不信，到了今年六月，蘇聯專家說有可能，到了九月他們就大為佩服了，說中國確有大躍進。一萬二千人，全國各地方調來的，全國各省的力量，技術力量，人的力量，完全不做禮拜天的，每天三班制，也不搞計件工資，許多人本來是作八小時，結果他作了十二小時不下工。多的四小時要不要錢呢？他不要。還有一些人，工程沒完成他不下來，有的兩天兩夜不睡覺，堅持在那裡不是八小時，也不時十二小時，而是四十八小時，就在工地上不下來。是不是要物質刺激呢？增加幾塊錢么？一個小時一块錢么，他不要，這些人不要。物質刺激還是物質刺激，無非是工資五十元，就是那麼一點，但是他們為着一個共同的事業而奮鬥。一萬二千職工，十個月搞成這麼一大片，這裏面不僅是按勞取酬，而且有列寧所謂偉大的創舉——“共產主義星期六”，有不計報酬在內。同志們，你們去看一下，……還有密雲水庫，……政治挂帥與物質刺激兩個東西，政治工作與必要的按勞取酬結合，我看是個好東西。我們凡是下了決心，有堅決的意志，人們認為不能成功的，結果它成功了，就是我們的這個大禮堂，很多人認為不能成功么！我們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很多人都罵，但它還是要成功的，并且

已經成功，或者繼續取得成績。比如鋼鐵是要快，工業是要快，農業也是要快。學習也是這樣，只要我們下決心，我看可以學好，不怕事情太多，時間不多，可以拚一拚！養成這個習慣。我們要戰勝這個地球，我們的對象就是地球，至于太陽上怎麼作工作，我們暫時不論，月亮、水星、金星，除了地球以外的什麼八大行星，將來探一探可以，拜訪拜訪可以，假如能上去。至於工作，我們打仗，我看還是地球，建立一個強國，一定要有這樣的決心，要求我們建立大禮堂，很多水壩，很多工廠，我看一定要是這樣。

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我們的目的一定可以達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議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議：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時候，特赦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已經取得了伟大勝利。我們的祖國欣欣向榮，生產建設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空前提高。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極為良好。黨和人民政府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實行的懲辦和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結合的政策，已經獲得伟大的成績。在押各種罪犯中的多數已經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確實已經改惡從善。根據這種情況，中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認為，在慶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時候，對於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實行特赦是適宜的。採取這個措施，將更有利于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於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繼續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這將使他們感到在我們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惡從善，都有自

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考慮上述建議，並且作出相應的決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党 内 通 信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們：

中央定于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們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會議（編按：即一九五九年三月在郑州召开的第二次會議）精神，以討論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六級干部大会，大約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三月十一日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問題的分析、揭露和討論，势必不充分，解决的不会很适当和很彻底，就是說，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問題的決議，第一书记要做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諸項政策問題。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样两个文件的思想的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三月十一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三月二十日或者二十二日才能結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身来，于三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致于太迫促。河南的六級干部大会，三月十日可以結束，他們的一个決議，一个总结性讲话，三月九日可以最后定稿。这两个文件，中央将在三月十四日以前用飞机送到你們手里，以供参考。河南

的下一步，是开县的四級干部大会，传达省的六級干部大会的方針，討論各县、社、队的具体执行方法。县的四級干部會議的出席人是：（一）、县级若干人，（二）、公社級若干人，（三）、生产大队級每队一人至二人，（四）、生产队級每队一人。外加若干观潮派、算帳派。共計少者千余人，多者两千人。會議七天至十天。河南各县定于三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同时开会，三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以前結束。三月份还剩下一个星期，留給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开会。总之，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問題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問題。四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意向地展开今年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么办。各省、市、区的六級干部大会，如果能象湖北那样在三月十一日召开，三月二十日或二十二日以前可以結束，三月底可以結束县的四級干部會議，四月十日以前可以結束社和队的討論，比河南也只迟十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会以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以为不宜如此。我們已經有了明确的方針，把六級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針即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們做的主动，观潮派、算帳派就无話可說，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罵我們开倒車。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級思想，不必全通，有三天时间也就可以了。从三月四日至十日，有六、七日时间做准备，还不够嗎？頂够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議。是否可行，还是由你們根据你們自己

的情况去决定。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上午四时于郑州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們：

我到武昌已經五天，看了湖北六級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問題需要同你們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經送給你們，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問題和粮食問題的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級社即現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級社已經分为若干生产队的，應該合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級社規模很小，經濟条件大体相同，已經合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員愿意合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經過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同志来此，和王任重同志一起談了一下。我問小舟，你們贊成河南办法，还是贊成湖北办法？他說，他們贊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們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級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三月十一日报告，他們主张三定五級。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級社（广东全省原有二万三千个高級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戶左右）为基础，有些大体相当于現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为

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級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經濟条件悬殊不大，經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作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級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那一种主张較好呢？或者两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說，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辯論这个問題，两派意見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級社）支书絕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問題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問題，采取河南、湖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們覺得勉强則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級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他們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已經做了决定，但是，仍請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級干部會議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見，如果他們同意省委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則不妨改一改。《郑州會議記錄》上所謂“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級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見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終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請你們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于武昌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会议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帐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鸣大放，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算帐派（有许多被人认为是观潮算帐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算帐派，他们被人们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的时间就够了。

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的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讲，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制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几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就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

社，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的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速施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时于武昌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给中央各部委、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党委书记）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书记、市委、市政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这些人的話，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的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問題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級，或者六級，或者七級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錯誤观点才能糾正，他们的僵

化头脑才能松劲，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話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說的是城市問題，乡村問題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已經大体說过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一日）

×××同志：

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事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少数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寿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議，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事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小组，由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說派一个强

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开始大办了。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现在也已经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同粮食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有人建议，把养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猪”，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说，农林畜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位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經驗。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又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它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一日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几个問題，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問題，包产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机关缺少經驗，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說越密越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怀疑。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問題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度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达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提一个密植幅度，不当做命令下达，只給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經驗，根据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几年以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問題，节约粮食問題。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

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食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规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试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化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

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情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种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省委、地委要进行研究，过去大家看了印象不深，应当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研究。其中一、二、三章有許多值得注意的。这三章許多东西是正确的，有些地方可能是斯大林自己沒有搞清楚，如第一章中的客观法則，計劃經濟怎样搞，只說了几句，沒有展开，或者他心目中苏联計劃經濟已反映客观規律。苏联在重工业、輕工业、农业問題上；对輕工业、农业不很重視，結果吃了亏。还有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結合的不好，主要是一条腿走路，同我們的計劃比較，究竟那个更适合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还有一点，斯大林只着重讲技术，讲技术干部，只要技术，只要干部，不要政治，不要群众，这也是一条腿。在工业上，注意了重工业，沒有注意輕工业，也是一条腿。重工业部門相互关系，也沒有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把重工业突出，讲鋼是基础，机械是心脏。我們提出，农业方面以粮为綱，工业方面以鋼为綱，我們提出以鋼为綱就有了原料，机械工业也就跟上来了。第一章斯大林提出了問題，提出了客观規律，但是沒有很好的解答这个問題。

第二章，讲商品，第三章，讲价值規律。我相当贊成其中許多观点。把生产分成两大部类，說生产資料不是商品，

值得研究。在中国农业上有很多生产資料还应是商品，我看他附的三封信，最后一封信差不多完全是錯誤的，表現很不放心和不相信农民对农业机械嗜住不放，一方面說生产資料归国家所有，一方面又談农民买不起，实际自己騙自己。国家对农民控制得很死，两个过渡斯大林都沒有找到很好的方法和道路，这对斯大林是件很苦恼的事。

資本主义留下商品形式，我們暂时还要保留下來，商品交换，价值法則，在我們生产中不起調節作用。我們起調節作用的是計劃，是有計劃的大跃进，是政治挂帅。斯大林只談生产关系，不談上层建筑，对上层建筑与經濟基础的关系不談。中国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下放鍛炼，破除旧的规章制度，都属于上层，都属于意識形态。斯大林只談經濟，不談政治，虽然說忘我劳动，其实多做一小时也不行，都不能忘我。人的作用，劳动者的作用不談。如果沒有共产主义的运动，想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困难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妥当，結果都离不开我，有人說是馬克思讲过的，是馬克思讲过的，我們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

資产阶级法权，表现为資产阶级法律教育。資产阶级法权思想，我們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現，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則，則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們也是資产阶级范畴。現在我們宣传破除一切資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少数人，如地主、富农、右派，他們想回到资本主义，提倡资本主义，但绝大多数人是想进到共

产主义。进到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不能一步登天。象人民公社，一方面要发展自给的生产，一方面也要发展商品交换。我们利用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为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利于过渡。我们国家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去年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而商品粮大约有八百至九百亿斤，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不发达，如棉、麻。所以要有这个发展阶段。现在还有很多县，搞了吃饭不要钱，就发不了工资，河北就有三县，有一县是能发工资，但不多，三元、五元。所以还要发展生产，要发展除粮食以外能卖钱的东西，西安农业会议，对这点没有十分注意。总之，我们是个商业不发达的国家，而且又很多的进入了社会主义。我们要破除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保留。现在有一种风气，觉得共产主义越早越好，有的提出三年五年，就过渡到共产主义，山东范县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是慢一点。

现在有些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雅罗申柯就不喜欢经济学。我们现阶段，以至将来一个时期，要使公社物资调剂扩大，还要使商品生产扩大，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我们有些同志碰到商品、商品生产就犯误会，资产阶级法权要破，天天破，如讲资格，讲等级，不利于供给制的长处……，一九五三年我们把供给制改为薪金制，这种作法基本上是对的，我们让步是必要的，但是有缺点，即等级我们也让了步。结果一个时期闹等级，经过整风，这个等级是降下来了，等级制度是父子关系，猫鼠关系，要天天破除。下放干部，搞试验田，就是改变这种等级的办法，没有这种改变就没有大跃进。

城市人民公社中资产阶级可以入社，可以当社员，但资产阶级帽子可以不摘。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提了二条：

（一）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二）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条所有制。一种是鞍钢式的全民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大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讲，则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作用。斯大林划了线，讲了三个条件，这三个基本条件不坏（书六十页），概括：增加社会产品，把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到产品交换。从交换价值到使用价值，这两条我们中国，第一扩大，努力增加产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下，工农同时并举，第二小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提高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不愿划这三条线的人，似乎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全民所有制，这是不对的。斯大林提出的第三条是讲的文化，全民发展体育和教育。为此，斯大林提出四个条件（第六十二页）A、六小时工作制，B、综合技术教育，C、改善居民条件，D、增加工资——增加工资降低物价，这特别是要这些条件是好的，但缺少政治条件。

以上几条，基本是增加生产，有了极大丰富的产品，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就好解决了。要增加生产，就要多快好省，要多快好省，就要政治挂帅，四个并举，整风运动，冲破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中国加上人民公社的这种形

式，則更加容易做到多快好省。

所謂全面全民所有制，含义如何？两条（一）社会的生产資料为全民所有；（二）社会的产品为全民所有。

人民公社的性质，公社是我国社会结构的工农兵学商结合的基层单位，在现在是基层行政组织，民兵是对外的，特别是对帝国主义的。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一是由社会主义目前到全面全民所有制，一是由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将来过渡完了，公社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机构。

（註：此文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旬在郑州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的一次重要讲话传达紀要。本文据紀录整理。）

对《答AB薩寧那和BT溫什爾 两同志》的几段批語

（約一九五九年）

这基本上是錯誤的。基本观点是不放心农民，不相信农民。对农业机器情佳不放，結果，国家对农民控制得死，农民对国家也控制得死。

整个看来，沒有看到人的作用。两个过渡，斯大林沒有找到道路和方法，只說生产关系，不說上层建筑。中国比如說整风运动，干部下放，两参一改，破除旧規，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問題，属于意识形态、政治問題。斯大林不談上层建筑，只說經濟，不說政治。

看来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問題沒有解决，大家吹一吹，研究研究。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句話不对，翻譯得不恰当。資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主要表现为制度。我們教育方面的制度破坏了一部分，三风五气也破除掉了。商品生产、价值法則还不行，現在要想破除一切法权思想是不可能的。

除右派、富农外，都愿进公社，但不能一步登天。公社一方面要发展自給性生产，一方面要发展商品生产。我們是商品不足的国家，是商品粮食不够的国家。公社应多发展

商品生产来改善生活。我們的經濟学家就不愿意談这个问题。不搞商品生产就发不了工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定要破，工资、待遇、等级，这些是不对的。一九五六年改工资是对的，那时让些步也是必要的。执行时有缺点，等级过多这些要破除，象貓和老鼠的关系一样。

公社的体制要注意，还是要有负责的組織兵团，调动劳动力是有作用的。公社食堂要办好，营养成分要研究。苦战几昼夜是可以的，但要注意休息，农村采取十小时工作制，两小时学习，跟城市不完全一样。陝北还要热炕头，大城市搞公社要慢点，北京自甘落后。

辯証法例舉（摘編）

（一）懂得分析，就是懂得辯証法

懂得分析，就是懂得辯証法。列寧說，辯証法可以归纳为对立统一的学說。这样一来，辯証法的核心就被掌握了。但需要解释和发展。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统一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和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所以平衡是暂时的，可以破坏的，我們的责任是日益不断地取得平衡。有本事的人不在于他能做到不发生匈、波事件，而在于匈、波事件发生后，能有办法把問題解决。

（二）什么事都要提出两个办法，

來比較，才是辯証法

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唯物論，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辯証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辯証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經驗是一个侧面；中国的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經驗應該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恶者而棄之。把苏联的經驗孤立起来，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那一套，不是有分析的，如象三岁小孩一样，处处要扶，喪其独立思考。什么事都要提出两

个办法来比較，这才是辯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

(三) 辩証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現象的

辯証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現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錯誤，即未抓住主要矛盾与本质，把次要矛盾当成主要矛盾来解决，把支流当成主流，沒有抓到本质。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个别問題解决得多，沒有抓住本质問題。这次會議把过去許多問題提出来商量解决了。

(四) 看問題要看本質，要看主流

馬克思主义告訴我們，看問題要看本质，看主流，看路綫，就是看他在本国内是否搞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否反帝，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是否搞国际主义。这样三条就构成一条路綫。我們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反帝的，搞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党。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些方面表現了馬列主义路綫的本质。他們是否是坚决，可以做一比較，象铁托，是不是坚决？他的东西，我看三条都缺少，反帝他是不怎么要的，总是讲美帝好，讲苏联不好。

(五) 对立統一与相互轉化

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工作，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面也可以两、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中的变化很大，更要相通情报。开会的目的是为了协调生产节奏，工作生产要有节奏，一波至来一波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統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

总路綫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緩与急的对立統一，劳与逸的对立統一。如果光有急和劳，则是片面的，专搞劳动，不休息，那怎么能成呀！做事总要有急有緩。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間必須有个休整、补充与休息，不可能一个接着一个打，打仗也要有个节奏。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維克化，“就是反对休整，主张坚决、勇猛、果敢、乘胜追击，直搥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是对立統一，这是規律，也是相互轉化的，沒有一种事情不是相互轉化的。急轉化为緩，緩轉化为急；劳轉化为逸，逸轉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緩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整与苦战也有同一性。起床和睡眠也是对立的統一，有古云：“久臥者思起”，睡轉化为起，起轉化为睡。开会轉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正如王熙凤所說“千里搭帳棚，沒有不散的宴席”①。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廢定，应以是否是真理而定。散会后，問題积起又轉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就有意見分歧，就轉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有时还不团结，因此团结要做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馬列主义，团结經過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轉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間的矛盾。沒有矛盾斗争就沒有世界，就沒有发展，就沒有生命，就沒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經過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水滾滾流的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也是这样。团结斗争團結，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轉化为消費，消費轉化为生

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費，生产者不仅仅是为了其它劳动者，而自己也是消費者，馬克思說，生产就涵着消費。生产与消費、建設与破坏都是对立統一，是相互轉化的。全国的生产是为了消費，为几十年更新設備。播种轉化为收获，收获轉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費种子，种子播下去，就生为苗，不下种子就无秧苗，收获以后又播下新的种子。生与死也是相互轉化的，生轉化为死，死物轉化为生物。我主张今后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为人非死不可，这是自然規律。糧食是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年年死一次，而且死得越多，生得越多。假如猪不杀掉就越來越少，誰喂呢？苏联《簡明哲学辞典》专门与我作对，它說生死轉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的轉化是不对的。究竟誰对？請問，生物不是由死物轉化来的，是何者而来？地球是无机物与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十二种原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轉化的。儿子轉化为父亲，父亲轉化为儿子；女子轉化为男子，男子轉化为女子，直接轉化是不行的，但是結婚后，生男育女，还不是轉化嗎？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相互轉化，就是地主資本家与工农的关系。当然，我們这个压迫者是对統治阶级而讲的，而不是对人民所讲的，这是讲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战争轉化和平，和平轉化为战争，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沒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綫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繼續，政治也是一种战争。总而言之，数量轉化为质量，质量轉化数量。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轉化的。而如果我們搞不好，也会轉化的。那时如果我們工业搞成世界第一，就会翹尾巴，思想就会硬化。无限轉化为有限，有限轉化为无限。

古代辩证法轉化为中世紀的形而上学，中世紀的形而上学轉化为近代辩证法。宇宙也是轉化的，社会也是轉化的，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要轉化的，也是有始有終的，一定会分阶段的，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是固定的。只有量变，沒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上沒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的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沒有了，太阳也会冷却的，太阳的热現在就比古代冷多了。冰河时期，一千二百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見古代是很热的。延长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是宋朝的，延长古代是生长竹子的，現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生有終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变化的。

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固定就很危险。高級干部，中央、省、地、县，各級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統有几十万人，要多想，不要老看經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六）正确路綫是在同錯誤路綫作斗争中形成的

錯誤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錯誤是正确路綫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綫是对錯誤路綫而言，两者是对立统一。正确路綫是在同錯誤路綫作斗争中形成的。說錯誤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沒有錯誤，这种观点是违背馬列主义的。問題是少犯或犯得小点。正确与錯誤是对立的統一，两点論是正确的，一点論是不正确的。只有正确沒有錯誤，历史上

沒有这种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观点就是形而上学。只有男人，沒有女人，否定女人怎么办？爭取錯誤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少犯錯誤是可能的，應該办到。馬克思列寧就办到了。

（七）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之否定，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經學——形而上学，現在又讲到辩证法。是不是？范文澜同志，你对这是很熟悉的。我看十五年后，尾巴肯定要翘起来，当然我不能因为事物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不鼓干劲了。即使将来出現了大國沙文主义，也会走向其反面。有一种正确东西，要代替大國沙文主义，有什么可怕。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都变成大國沙文主义。列寧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現在的辩证法，这也是否定之否定。

（八）有紧张有休整

有紧张有休整，常紧张不行，又紧张又松弛，太累了不好，太紧了不行。河北、河南大办又紅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太紧了，上課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不敢打瞌睡。我們要有快有慢，张而不驰，文武不能也！驰而不张文武不为也！，文王、武王人家是圣人啊！尚且不能。有紧张有松弛，有团结有斗争，只有团结没有斗争不行；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斗争，但目的是为了团结。阿Q最伤心的是不准他革命。不帮他改过，一味批评不好，一斗二帮，要

有好心。沒有好心，起心不良不好，无非是打倒你，我来。多一个人好，少一个人好？人多一点子好，要調动一切积极因素。

（九）对立面的轉化

中国有个好处，一个是劣，一个是有，这也有两面性，劣就要革命，知識少是不好的，但好比一张白紙，这一面写过了，就沒有什么文章好做了，这一面沒有写过，是空白的，就大有文章好做，几十年后就可以赶上外国。

（十）死活斗争問題

死活斗争問題。死活斗争一万年也有。控制死还是不控制死呢？沒有死不行，統統死也不行，一点不死也不行。如鋼指标，死者保证重点，活着在重点之外，不妨碍重点，大包干就是有死有活，大家都要管。死与活两方面，就是统一与分散兼两者有之，包干制就是有死有活的矛盾的统一。大权独攬，小权分散，就是这个道理。

（十一）真理与謬論是对立的，正确

是与錯誤斗争中产生的

真理与謬誤是对立的，正确是与錯誤斗争中产生的。美与丑是对立的。沒有好人就沒有坏人，沒有坏人就沒有好人，沒有大好人，就沒有大坏人。香花与毒草，我們不怕毒草，长多了所有的人都来挖了。真理是和錯誤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斗争中好人增加，坏人减少。什么是毒草？我問过布尔加宁。西红柿一百多年前在欧洲是毒草。我也讲过許

多历史人物，耶穌、伽里略、哥白尼、馬丁鮑德、孫中山、共产党等都曾被认为是毒草。这个阶级认为是毒草，那个阶级确认为是香花。如杜勒斯是美国资产阶级的香花，但世界人民认为他是毒草。蒋介石是什么？是香花还是毒草？看过，大革命时期看过，抗战时期喊过他万岁，蔣委员长是我的老朋友。这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斗争，有比较，才能辨别，才能够发展。没有比较，怎能发展，怎能创造？马列主义是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十二）设置对立面

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就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有，放不放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搞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劳动人民起来与他辩论，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员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几乎占一半。三十万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人民，便于人民去分析。另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但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的办法去设置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它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制造厂是新的，是人民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的造，但要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着规律就上去了。我们是客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莫洛托夫分裂，我看对苏联有帮助。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搞分裂，对我们有帮助，两次王明路线，内战时期的三次“左”倾路线教育了我们的党。这许多的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人为的制造莫、高、陈也不必要。只要有一定的气候他

才出来，没有什么可怕，要克服它们。所谓的乐观主义是我们主要方面。忧愁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发急吗？我就有点的发急。要讲领导艺术，使坏事变好事。早有预见也可以使它不发生，发生了也可以变成好事。一千二百万党员有二、三万有觉悟有预见就不怕。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爭取不打，但打也不怕。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路线错误的，要允许它改过。现在我们很团结，没什么事，中央、地方都很好，反冒进問題現在搞清楚了，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十三）设置对立面很重要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是客观存在的。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如我们对于右派，让它放，让它讲，这是有计划的，这样做是要设置对立面。整风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大字报、双反，也是为了设立对立面。所谓对立面，要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方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十四）听取对立面的意見

尊重唯物論辩证法，这是提倡爭論。要听取对立面的意見的，把問題提出来，揭露对立面。

（十五）研究辯証法的問題

郑州會議不知那个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的問題，这很好。如果是“大自由、小集体”，杜勒斯、黄炎培、荣毅仁就会欢迎的。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都是对立统一，两

两条腿走路也是对立统一，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马克思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同时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要给它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定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连云港不是中型吗？有没有小洋群？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是复杂的很。这些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穷得要命，搞点小土群也好啊！专搞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上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低产、高低产同时存在，大行耕做“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间休，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发展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水，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也包含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集体的生产方式，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企业中，应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造成是截

才出来，没有什么可怕，要克服它们。所谓的乐观主义是我们主要方面。忧愁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发急吗？我就有点的发急。要讲领导艺术，使坏事变好事。早有预见也可以使它不发生，发生了也可以变成好事。一千二百万党员有二、三万有觉悟有预见就不怕。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打不打，但打也不怕。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路线错误的，要允许它改过。现在我们很团结，没什么事，中央、地方都很好，反冒进问题现在搞清楚了，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十三）设置对立面很重要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是客观存在的。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如我们对于右派，让它放，让它讲，这是有计划的，这样做是要设置对立面。整风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大字报、双反，也是为了设立对立面。所谓对立面，要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方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十四）听取对立面的意见

尊重唯物论辩证法，这是提倡争论。要听取对立面的意见的，把问题提出来，揭露对立面。

（十五）研究辩证法的问题

郑州会议不知那个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的问题，这很好。如果是“大自由、小集体”，杜勒斯、黄炎培、荣毅仁就会欢迎的。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都是对立统一，两

两条腿走路也是对立统一，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马克思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同时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要给它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定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连云港不是中型吗？有没有小洋群？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是复杂的很。这些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穷得要命，搞点小土群也好吗！专搞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上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低产、高低产同时存在，大行耕做“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间休，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发展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水、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也包含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集体的生产方式，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企业中，应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说成是截

然分开，是不对的。以上这些可否都构成是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又抓生产，又抓生活，这均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了热情与科学分析相结合的问题。订计划又冷又热要雄心很大，但又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样，与我们的雄心大致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而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明年搞三千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紧得要死，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定额压缩一下，不要订那么多，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也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在内。订得低点，实践把它提高了，这并不是机会主义。解放后，钢成倍的增长，在世界上从古到今就没有过的，怎么说是机会主义呢？这里也联系到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整个世界工人阶级国际团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有点抢先，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看起来不象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个问题。苏联的科学家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点，他们的积蓄日益增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十五年准备

进入，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即使我們可能先进入，也不應該。十月革命是列寧的事业，我們不都是学习列寧嗎？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馬克思那里去請教，如果那样子，可能在国际問題上犯錯誤，这也是个問題。要讲相互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問題。

(十六) 对待同志要采取辯証的方法

我們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敵對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團結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辯証的方法，而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辯証的方法？就是对一切予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錯誤的，不因为一个人犯錯誤否定他的一切。列寧曾讲过，不犯錯誤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我是犯过許多錯誤的，这些錯誤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錯誤也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樁”，这是中国的成語。中国还有一句成語：“荷花虽好，也要綠叶扶持”。你赫×××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綠叶扶持。我×××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綠叶扶持。我們中国还有一句成語：“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諸葛亮”。我們是搞集体领导的，单独一个諸葛亮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我看要自称全智全能，象上帝一样，那种态度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錯誤的同志應該采取什么态度呢？應該有分析，采取辯証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們党也曾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要全部毁灭他。后来我們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学会了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的統一，承认这

个观点，对犯錯誤的同志怎么办呢？第一是要斗争，要把他的錯誤思想彻底批判，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它。一是斗；二是帮，由此出发帮助他改正錯誤，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象鐵托那种人，象中国的陳獨秀等这些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象希特勒、蔣介石、沙皇也都是无法救药的，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們來說，沒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

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說来，也是如此，他們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主义代替唯心主义，用无神論代替有神論。这是在战略上說的。在策略上就不同了，就要妥协了。在朝鮮三八線上我們不是同美国人搞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同时又要善于妥协。現在谈到同志关系。我提議同志之間有隔閡，要开談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入共产主义就都是聖人，沒有分歧，沒有缺点，不能分析，就是說鐵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談判了。好象一进入共产主义，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馬列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馬列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五十的馬列主义者，有些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馬列主义。我們可不可以小范围里两个人或几个人談談呢？可不可以从團結出发，用帮助的精神談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談判，这是共产主义人民內部的談判。我們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在談判？国际上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在談判呢？实际上是在談判。也就是说，在不損害馬列主义原則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見，放棄自己一些可以放棄的意見，这样我們就

有两支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和他做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列主义原则，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是马列主义的原则，这是对立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说法不对。不能说找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着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认为一个人是不可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原子弹里头，就充满着矛盾；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又有中子和质子的对立；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而不尽的。关于对立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要作广泛的宣传，我们的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里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上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做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优点，第二点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十七) 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是允许人家革命，人家犯了错误，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它改正。“阿Q正传”是一篇好文章，我劝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再看一遍，

没有看过的人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文章里是写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写他最怕人家批评，一批评就和人家打架，他头皮上长了几处癞疮疤，自己不愿说，也怕人家说，越是这样，人家说得越厉害，结果闹得极为被动。但是鲁迅在这里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赵太爷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所谓的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赵太爷也还是不准。对于黄逸峯、张秀云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光看还不行，还要帮他改正，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缺乏“帮”的人，思想是不正确的。人家犯了错误，你就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高岗跌跟头就是跌在这上面，他无中生有的说什么四人圈圈，两个摊摊。就算有吧，也应当是一看二帮，但他不愿这样做，结果跌得爬不起来。对于革命来说，总是人多一点好。犯错误的人，其中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并且每次错误都有他的份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症的人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也可以少犯很多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很容易犯错误，因为他的尾巴翘得太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会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心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视的态度还是采取帮助的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八) 十个指头的問題

气可鼓不可洩，有时沒有經驗，使群众受挫折。一个时期在一些問題上发生了錯誤，如合作社會有人說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輪双鋒犁在南方名譽不好。举登徒子好色賦为例，宋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个办法不好，右派就用这个办法攻击我們。人有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生疮，就要請医生医好，不能把他砍掉，另外九个指头还是好的，往往有人看到一个指头坏了，就說十个指头都坏了，右派是这样攻击我們的。但好人有时也这样看，共产党也有这样的人。共产党也好，民主党派、工商界、高級知識分子也好，多数人是可以进步的，就是右派多数人也是可以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没有信心了。对人民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好的。現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剝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至三，对他们除个别人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們改造过来。

(十九) 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問題

我們同志对十个指头，往往搞不清，一出事，就忘了十个指头。劳动人民内部有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問題，我們同志犯了錯誤也是如此。我这不是讲古大存、李士农、潘××、陈再励、李峯。吳圃芝同志发言很好。安徽发言为什么不讲李士农，浙江讲沙文汉也讲少了，要献宝让大家見識見識。为啥不讲他們这些人？他們这些人不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問題，沙文汉是十个黑指头，陈再励也是十个黑指头，李士农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我讲的犯

錯誤的同志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人，是在大风大浪中有动摇，現在又看清楚了，不是指的这些人。要团结，要保护，要坚持保护各級积极分子，虽然有錯誤，但他们积极，他们怕大鳴大放不下不了台，坚决保护就下了台了，他们的錯誤只有十分之一，在整风中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青島會議的文件就讲了保护干部的問題。以前也有，劳动人民內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个别的例外。資產階級的中間派，中中是五个指头与五个指头；中左是六个到七个好指头；中右是六个到七个黑指头資產階級的东西，他們长期反对人民的腦筋一下子洗不干淨，需要几次反复，資產階級思想还要反复，大的沒有，小的可能。罗××說反革命还要反复，还提到群众路綫，讲得好，資產階級也会起风浪的。十二級台风面前，我們有些同志还会搖摆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反复，但有了去年一年的經驗，全党經歷了一次鍛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釣魚船。波匈事件我們沒有問題。去年那么大的风浪，我們的船沒有翻。有人說：“这是为什么”的社論写早了点，也不早，再下去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員中搞出了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一半。他們还是猖狂进攻，說章、罗划了右派，他們就不进攻了吗？他們进攻，只要有了一定的溫度，这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不要忘記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就是忘了这个問題，不从本质上看問題，要从中吸取教訓。

(二十) 十个指头的問題

十个指头的問題。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善于学会区

別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或者多數指頭與少數指頭。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有區別，這件事看來簡單，但許多人不懂得。要宣傳這種觀點，這是大局與小局，一般和個別，主流和支流的區別。我們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錯了一定翻跟頭。這是認識問題，也是邏輯問題。說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這種說法比較生動，也比較合乎我們的工作情況。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但是這種說法對於有些人却不適用，例如：右派分子，許多極右分子，幾乎是十個指頭都爛了，學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是爛了一個指頭，但又不是全爛了，所以說還可以留在學校里。

“攻其一點或幾點，盡量夸大，不及其余”，這是一種脫離實際情況的形而上學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用的就是這種辦法。我們黨在歷史上吃過這種方法的大亏，這就是教條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期，立三路綫也是如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也用這種方法，陳獨秀路綫和抗日時期的王明路綫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張國燾也用過這種方法。

(二十一) 辩証法則是對立與統一的

看問題，所以說是全面的

生與死，戰爭與和平，是對立的、矛盾的，實際上他們之間又有內在的聯繫，所以，有時這種對立又能統一。我們認識問題不能只看一面，應該全面分析，透視他的本質，這樣對認識一個人來說，就不可能一下子什麼都好，一下子又壞得不得了，連一點好的都沒有了。為什麼我們的黨是正確的呢？就是因為我們認識和解決一切問題都能從客觀情況出

發，這樣就比較全面而不是絕對化。

(二十二) 不斷革命論與革命階段論

合作社發展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一波一浪地前进，兩波之間有一伏，兩山之間有一谷。

領導要看風使舵，隨機應變，情況不好，立即剎車。在適當時機壓縮人們的腦子，在膨脹起來的時候是必要的。有人說是不是要憂慮，要有清規戒律。當然要，必要的憂慮，必要的清規戒律都是要的。猪八戒還有三規五戒，必要的間歇，必要的暫停，必要的剎車、關閘都是要的，辦法是當人們翹尾巴的時候，就給人們提出新的任務，比如我們現在提出比質量，使人們沒有時間，來不及驕傲。

(二十三) 片面性有兩性

片面性有兩種：教條主義與機會主義（修正主義），隨定一在文章中已說過了。教條主義想肯定一切，百分之百的布尔維克，後來查一查，經過十年（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差不多都沒有了。教條主義在中國有，外國也有，把馬列主義片面化，他們是从形而上學解釋馬列主義的，工作只准講好，不能講壞，只能贊揚，不能批評。“圍剿王蒙”，我也過甚其辭了，現在我們來解圍，把王蒙救出來。他的文章有缺點，但他批評了官僚主義就批評不得？官方人士講不得？過去我們講階級鬥爭，確有很多的學問，但也產生了一些簡單化，行政命令。過去因為搞革命鬥爭要迅速，有些問題確實不能花好多時間討論來解決，這是奪取政權時期的做法，一些同志養成了這種作風，只有這些經驗與作法，特別

是在军队中工作久的，容易犯这种毛病。围剿王蒙就象解放军作战中调几个团把敌人包围起来一样。另外一个就是“否定一切，否定工农的事业，否定几亿人民的斗争，使人丧失信心，一切都黑暗，这不合乎事实”。社会主义建設的伟大事業，一切都好，也不合乎事实。钟涵棐作了一件好事，揭露电影工作中的缺点，要經心把已揭露的缺点都加以改进，但片面性的要把它指出。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传达錯了，今天要当面声明。我很不贊成那文章，我說过，他們忠心耿耿，要想保卫党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仇視毒草的情緒，但是才“放”了几个月，出了王蒙、牛鬼蛇神等。认为成績甚少坏处甚多，“报告老爷，大事不好了！出了妖怪！”大有不可終日之势。这对形势的估計是錯誤的，对党的方針是怀疑的，采取的方法是简单化、无說服力的，批評王蒙的方法是“短促突击”，使人看了就不服，我就不服，我和王蒙既素不相識，跟他又不是儿女亲家关系，但我就不服。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这两派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都是形而上学。但都要帮助他們改正錯誤，这不是他們个人的問題，是代表了很多人，共产党员里面有，党外沒有嗎？五百万人中有教条主义也有机会主义，共产党內也有“左”派、右派，即有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有人說写文章，不可能沒有片面性，这话有点道理。我刚才說了那么多的馬克思，要求人人沒有片面性，这不可能，也不合乎实际。事实上批評起来，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經驗讲话的，站在一方面說話的，但是另一方面，片面性是违反辩证法則的。可不可以要求多点辩证法呢？是否可以把辩证法逐步推广、逐步多起来呢？我想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一

天一天，一年一年，有更多的人，更多的作家、教授，看問題比較全面。所以說有片面性是事實，但是要求逐步克服片面性。是否以后就沒有了呢？还会有的，一万年也还会有片面性的，也还得推广辩证法的，辩证法还得发展。总之，要求逐步推广辩证法，六亿辩证家。对人民內部事情，要分析，要讲道理，不靠扣帽子，要讲辩证法。写文章时要有說服力，不要摆出官僚架子，拿着官样子，以为自己是部长、局长、处长等等，要把这些抛到九霄云外去，要忘記自己是官，要跟任何人平等。官虽大，錯了还是不成的，斯大林的官还不大？錯了还是不成。摆老資格，“我革命时你还在桌子底下爬呢！”拿出这一套，人家就不爱听。辩证法逐步多了，形而上学逐步少了，这就能逐步克服片面性。

（二十四）两种片面性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馬列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們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錯誤思想，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問題的方法是“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們就会大进一步。另一部分人是有右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錯誤思想，这些人比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們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們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有千絲万縷的联系。几个月来，人們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應該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許多錯誤不能改正。現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馬列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經驗來說，前者較多，后者只是

个别的，因为他們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別，沾染了小資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的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錯誤；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馬列主义，被一些錯作为“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覺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們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实的損失來說，“左”比右沒有什么好，因此應該堅決改正。

(二十五) 紅白喜事問題

——突变是宇宙最根本的規律——

紅白喜事問題。以前讲对待可能的大突变，主要是讲的战争和党内分裂問題。中国人把結婚叫做紅喜事，死了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辯证法的。因为結婚要生孩子，母亲就要分裂出小孩子来，分裂出三个、二个，甚至十个、八个，象航空母舰一样，太多了也不好。人生人是喜事，一变二，二变四。至于死亡要哭，要开追悼会，也是喜事，人总是要死的，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这就不妙。讲辯证法，沒有死亡是不对的，是形而上学。有灾难應該說是一种自然現象。突变是宇宙最根本的規律，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假如蒋介石死了，我們都会鼓掌，杜勒斯死了，我們也不会掉泪。但对新事物的死亡，如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失敗，南方我們根据地的丧失，这都不好，如苗子被暴风雨或雹子打掉了，这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的問題，我們共产党是希望事物变化的。所謂跃进，就是和过去不同，七年赶上英国，十二年赶上美国，就是十五年赶上美国，也是个突变。当然突变不是

一下子来的，七年赶上英國要分七个阶段，一年为四季，有十二个月份三百六十五天，这中间有許多部分的突变，但大部分是量变，如煤二、三年就能赶上英國，在这点上突变比量变好，沒有量变就沒有突变，沒有量变搞突变就沒有根据，就是冒险主义。平衡的破坏，由不平衡走向新的平衡。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压得很紧，这是好事。平衡、量变、團結是暫時的，相对的；不平衡、突变、不團結，則是絕對的，永遠的。有两个人就发生了團結的任务，何况六亿人口。我看常任代表談判搞对了，这次代表大会好开，因为有南宁、成都会議了。所以年年要讲團結，就是因为年年有不團結，每人想法不同，黨員水平不同，就必须开会，采納比較合理的意見。明年再开会，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为好，这次會議，有些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他們讲了許多好的意見。每天要讲團結，是因为每天有不團結，象小孩子身上的細胞一样，要新陈代谢，旧的不死亡，对小孩的发育不利，新陈代谢，是姓陈的去了，姓謝的来了，这里我不是說赶走了陈伯达。长江后浪推前浪，事物都是变化的，現在有一百零二种元素，过几万万年，就可能不是一百零二种了，可能是二百多种元素了。事物是要起变化的，要变到它的反面去。我們一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是有出党的，有受批评的。湖北省有哥妹俩貼大字报，哥哥老资格有官气，真理在妹妹手里，結果哥哥輸了，妹妹贏了。浙江父亲儿子爭論密植，儿子贊成，父亲反对，結果父亲輸了，儿子贏了。这是一般規律，做父亲、哥哥的意見有相当危险就是了，也沒有关系，問題是向儿子、妹妹认輸就是了。我所讲的是党的大分裂，象莫×××、高崗那样。我們党有四次

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光（章），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是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出现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一百年或几十年世界会有大变化，苏联不用十五年就可以赶上美国。这样讲可能大家不舒服，我看讲了才舒服，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法斯特，过去的陈、罗、章、高搞分裂，最近有丁玲、李峯、沙文汉、李士农、孙作宜、陈再励……也在搞分裂，北京政法、文艺系统垮得多，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世界上总有分裂的，新陈代谢么！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象细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象细胞成长一样。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经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没有了，用莫斯科会议来代替，以后十二国有事由苏联召集，内部通过了个决议，因为波兰不同意，所以没有发表。

（二十六）对立统一的规律、质变

量变的规律、否定与肯定

的规律永远是普遍存在的

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之后，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与否定的规律，永远的普遍的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上先

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就是形而上学。

（二十七）两种可能性问题

两种可能性问题。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比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也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说来，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的。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时张国焘又分裂为两个中央；高、饶是部分分裂。部分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分是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有细胞的死亡，从小孩起就有这种现象，这样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死亡就不能生存。人若不死，那就不得了，死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之前，是巩固的问题。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有了准备，可能会避免大的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莫事件是中型的。每

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的开除，有的进来，有的工作很好，有的犯錯誤，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寧經常說，事情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們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胜，或者灭亡。列寧不隐瞒灭亡这种可能性，人民共和国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們手里沒有原子弹，敌人占北京、上海、武汉，我們上山打游击，倒退十几、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我們要积极准备，爭取三、四年內搞出几千万吨鋼，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們比現在更巩固。我們現在在世界上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門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一千零七十万吨鋼。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現在不过是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們是强国，在軍事装备上和經濟上我們是弱国。因此，我們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爭取三年有較好改变，三年內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有七年時間就比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現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報紙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的神乎其神，就飘飘然。其实好鋼只有九百万吨，軋成鋼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万吨。不要自己騙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們进了七千五百亿斤，即翻一翻多一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們只怕沒有，所以打折扣。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薯类，要估計到里面，索性讲清楚。这个問題在省、地、县，要开个会說一說，这样讲有的人不爱听，我就偏偏讲这个倒霉的事，无论是公社、公共食堂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

国家灭掉，打游击。我們有条馬克思主義的規律管住，所有这些倒霉的事都是暫时的、局部的。我們历史上多少次的失敗，都证明了这点。我們的长征三十万军队变为二万几，黨員由三万变成几千，都是暫时的、局部的。資产阶级灭亡，帝国主义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敗、灭亡則是暫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是失敗，也是暫时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后，又拿起枪来打游击。“天有不測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來稀”，总是要灭亡的，个別人总是要死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話。人皆有死，而整个人类是要发展下去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还想于他几年，……

（二十八）两种实际可能性

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現實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現實的可能性。如現在要去火星是非現實可能性，将来可能是現實的。可能性有两种，有可能轉化为現實的是有現實的可能性。一种是不能轉化为現實的可能性。如过去的教条主义不是百分之百的证明了吗？不是地方都丢了嗎？我看非亩产八十斤不結婚，是非現實的可能性。

（二十九）波浪式的前进是必然的

經濟建設不是一点沒有进退的、四平八稳的前进着，建設也是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馬儿跑得快一点，有时跑得慢一点，有时要上馬，有时要下馬，这种情况完全是可能的。因为，第一我們沒有經驗，第二我們的經濟建設要以形势為轉移，比如過去的經濟建設可能快了一点，那时因为当时

存在着战争形势，如果马上要打仗的話，重工业搞多一点，就有必要。經濟建設的进行，是波浪式的，有起有伏的，一浪逐一浪，就是說，有平衡、破裂，而破裂之后，又恢复平衡。当然波浪式的前进也不能太大，可能一下子冒进，一下子保守，可是循着波浪式的規律发展前进，则是必然的。如果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今年冒进一点就不是了不得，明年搞少些就得了吧。总的来讲，我們的第一个五年計劃是正确的。

(三十) 任何事物都有統一性和独立性

現在來談每个工厂在統一領導下的独立性問題。任何事物都有統一性和独立性，人也有統一性和独立性，現在开会是統一性，散会以后是独立性，有的人去散步，有的人去讀書，有的人去吃飯，各人都有各人的独立性。紀律性和无紀律性是相互对立的东西，要有紀律性，也要有无紀律性，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如果我們不給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无紀律性、“自由主义”，一直把会开下去，无休止的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死光嗎？所以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人都要有独立性，都要有与統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工厂的工人，合作社的农民，都必須照顾，这是一个大問題，是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問題，必須引起全党的注意。

(三十一) 我們要統一也要特殊

我們要統一，也要特殊，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必須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崗那样的特殊，而是为了集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統一所必要的

特殊。

(三十二) 正当的积极性和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

正当的积极性和正当的独立性都应当有，省、地、县、区、乡都应当有，中央对省市，省市对地、县、区、乡都不能抓得太死，可以統一的应当統一，必須統一；不可以統一的，不应当統一，不能强求統一，地方应当爭这个权力，不要怕戴这个地方主义的帽子，这种从全国全体利益出发的爭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爭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中央准許的独立性是正当的独立性，这不能叫做鬧独立性。

注 釋

①休黛玉因席終人散而伤感，这是形而上学，是不懂得有聚必有分的客觀規律。王熙凤很不討人喜欢，但她說：“千里搭长棚，沒有不散的宴席”，却是辯証法。

关于鎮反工作和肅反工作的批語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斗争中必须坚持的一个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

（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

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行动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

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道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所谓协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

关于鎮反工作和肅反工作的批語

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办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协从不问之列。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对那些已经实现了彻底镇压方针的地方，则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杀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有计划，讲策略，作宣传，不杀错，这些也是当然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

镇压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

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须作好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由上面控制。

凡工作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

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处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

“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并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五日)

看法妥当，让他们活动，注意观察，大有可为。他们是在如来佛手掌中，跳不出去的。你们应当当作一件大事去办，积极而又艺术地去做观察和侦察工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

对张闻天信的批语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

印发各同志，印一百六十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热情欢迎洛甫同志这封信。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

附：

洛甫八月十八日上午庐山临别赠言毛泽东

泽东同志：

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今天读到你关于放乖“七发”的批语和机关枪及其他，更使我深为感动。

因为没有得到你的通知，所以我没有去看你。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

张闻天

八月十八日上午

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的批語

斯大林这本书从头到尾沒有讲到上层建筑，沒有考慮到人，見物不見人。供給制促进经济发展有利，應該扯一扯。有商品生产好，还是沒有商品生产好？大家要研究研究。斯大林最后一封信的观点，几乎全都是錯的，基本錯誤是不相信农民。

一、二、三章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沒有弄清楚，如計劃經濟有話沒有說完。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不够高，比資本主义是快的。工农业关系、輕重工业关系沒有讲清楚。

看起来是吃了亏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沒有蓬蓬勃勃地发展。他們是一条腿走路，我們是两条腿走路，他們是讲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只讲专不讲紅，只讲干部不讲群众，这也是一条腿。在重工业方面，沒有找到主要矛盾，如鋼是基础，机器是心脏，煤是粮食……我們是以鋼为綱，是工业的主要矛盾；农业是以粮食为綱，其它按比例发展。

第一章讲掌握規律，但怎样掌握規律沒有提出。商品生产、价值法則，許多观点我們是贊成的，但也有問題。把商品生产限于生活資料倒不一定。第三封信的基本观点是不相

信农民，主要是对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沒有找到。商品生产、商品交換这个形式，我們是保留下来了。价值法則我們要讲計劃，并讲政治挂帥，他們只讲生产关系，不讲上层建筑，沒有讲政治，沒有讲人民的作用。沒有共产主义运动，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①。

(一) ……他們把下列两种东西混为一談了：一种是科学法則，它反映自然中或社会中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觀过程；另一种是政府所頒布的法令，它是依据人們的意志创造出来，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无论如何是不能混为一談的。（第一頁）

(一) 此法則基本观点正确，但缺点有二：
第一，对党和群众的主观能动性闡明得不够；
第二，不够完整，沒有說出政府法令之所以正确，不仅出于工人阶级的意志，而且由于如实地反映了客觀經濟法則的要求。

(二) ……当然，在天文、地質，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們即使已經認識了它們的发展法則，也确实无力去影响它們。（第二頁）

(二) 这論点不对，人类認識、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未从发展看問題，現在作不到的，将来作得到。

(三) 对于经济发展法則，对于政治经济学法則——无论指资本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都是一样——也必須这样說。在这里，也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經濟发展的法則是反映不以人們意志为轉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觀法則。（第三頁）

(三) 計劃經濟如何搞？对于輕工业、农业不够重視。

(四) 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在同一地方說：

“人們自己的社会行动的法則，直到現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們的自然法則一样而与人們相对立，这些法則将被人們熟練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們的統治。（第三頁）

（四）自由是被認識了的必然客观法則，是与人們对立的、独立的，認識了它，就能統治它。

（五）苏維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来决定的：第一，苏維埃政权不是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如象以往革命中的情形那样，而是消灭了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國內缺乏任何現存的社会主义經濟的萌芽，苏維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謂“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經濟形式。（第四頁）

（五）社会主义經濟法則的必然性，要去研究它。在成都会議上我曾說过：要看看我們这一套（多、快、好、省，三个并举，群众路綫）会不会翻筋斗，能不能成功？这要几年甚至上十年才能证明。革命規律，过去也有人怀疑，現在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敌人已被打倒。社会主义建設能否搞起来，人們还有怀疑。中国的作法是否适合于中国的經濟規律，还要研究，我看大体适合就可以了。

（六）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

（第四頁）

（六）我們对于社会主义經濟形式的創造，有苏联的先例，因此应当比苏联搞的好一些，搞糟了就证明中国的馬克思主义者不行。任务困难而复杂，这与苏联一样。

（七）有人說，我国国民经济有計劃的（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維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現存的經濟法則和創造新的經濟法則。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們的各个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跟国民经济有計劃、按比例的客观經濟法

則混为一談。（第五頁）

（七）这一段是中心。

（八）……这就是說，国民经济有計劃发展的法則，使我們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計劃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現實混为一談。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經濟法則，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練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則的要求的計劃。不能說，我們的各个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都完全反映出这个經濟法則的要求。（第五至六頁）

（八）此章中心說明，不能把有計劃按比例的客观法則与計劃混为一談。我們过去也制定了計劃，但时常发生风潮。多了、少了，盲目的碰，不知怎样才好。經過了曲折、馬鞍形的教訓，大家动脑筋、想办法，才找到了农业綱要四十条，現在正在实现，正在制定新四十条。苦战三年再发展，充分討論再行。是否能实现，还要到客观实践中证明。工业搞了八年，不知道以鋼为綱。这是工业矛盾中的主要方面，也就是一元論。大、中、小，以大为綱。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綱。矛盾两方面，有主要一面。八年成績当然是主要的，但是个摸索过程。不能說我們完全正确計劃了生产，完全反映了客观規律。計劃是全党来搞，不只是計委、經委，而是各級搞，大家搞。斯大林这段話在理論上是正确的。但是并未仔細研究，展开說一說清楚。苏联沒有大、中、小，地方中央、工农业并举，都沒有两条腿走路，规章制度束缚人。我們也沒有相当充分的研究、掌握，因此我們的計劃也沒有完全反映客观法則。

（九）我們来分析一下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吧。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認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沒有指出，究竟

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資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資料，即一切生产資料轉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資料轉归全民所有。这就是說，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了解成这样，也可以了解成那样。（第七頁）

（九）这一段分析得到：問題是把它分成二个部分。說生产資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

（十）在原书第七頁，对“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問題”这一章，毛主席有如下一段批語。）

（十）商品存在的条件，闡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最終与生产力也有关，因此即使是完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了，某些地方仍要通过商品来交换。

（十一）由此可见，恩格斯所指的是这样的一些国家，在那里，不仅在工业中，而且也在农业中，資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充分发达，以致可以剥夺全国的一切生产資料，并把它们轉归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認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資料公有化的同时，还應該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第八頁）

（十一）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公式的分析是正确的。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看見商品生产就发愁，以为是資本主义。看来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商品生产还要大大发展，貨币也要增加，这是几十万干部的思想問題，是对五亿农民的团结問題。我們現在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資料，似乎有人想立刻宣布全民所有制，剥夺中小生产者，而不宣布范围，究竟是社所有，还是县所有？这样廢除了商品与商品生产，只宣布全民所有，就会剥夺农民。一九五五年末連征帶购，搞了不到九百亿斤，鬧得很厉害，人人談粮食，家家談

統购。这还是购，还不是調拨，后来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才緩和了。这个事实，現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人忘了。

（十二）在这里，我撇开了在英國国民经济中占有巨大比重的对外貿易对于英國的意义这个問題。我以为，只有研究了这个問題之后，才能最后解决在英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資料收归国有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問題。

（第八頁）

（十二）命运，就是廢除不廢除商品生产問題。

（十三）但是这里有一个問題：如果在某个国家內，也曾在我們国家內，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推翻資本主义的有利条件已經具备……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第八至九頁）

（十三）总而言之，沒有摸到商品生产的規律。中國经济学家尽書本是馬列主义，碰到經濟实践，馬列主义就打了折扣，思想很混乱。我們若犯了錯誤，就要把农民引到敌人那里去。

（十四）列寧的回答可以簡括如下：

甲、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應該夺取政权，不要等待到資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十五）乙、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資料，并把它们轉归全民所有；

（十六）丙、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要逐漸地把他們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規模的農業企业、集体农庄中；

（十七）丁、以一切方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規模生产的現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給他們头等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十八) 戊、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經濟結合，要在一定时期內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換）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經濟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維埃貿易，即国营貿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貿易，把所有一切資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历史，證明列寧所策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十九) 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众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資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第九至十頁）

(十四) 这一段分析得正确。拿中国情况看，有发展。这五条都是正确的。

(十五) 我們对民族资产阶级是贖买政策。

(十六) 我們发展人民公社，規模更大。

(十七) 我們正在作。

(十八) 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商品生产还要搬斯大林，斯大林是搬列寧的。列寧說全力发展商业，我們应当說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商业。問題的性质是农民問題，有人把农民看得比工人还高明。这五条我們都作了或正在作。有些还发展了，象公社办工业，工农业并举。

(十九) 列寧也这样說过。

(二十)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賴周围經濟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資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它在奴隶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資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沒有引导到資本主义。（二十一）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沒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

(二十二) 它由于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建立，僱用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剝削制度的消灭等决定性的經濟条件，(二十三) 而受到极严格的限制，試問，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內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資本主义呢？（第十一頁）

(二十) 这句话有些勉强，作为資本主义制度是沒有的。

(二十一) 二中全会提到利用、限制、改造政策。

(二十二) 我們完全有了这个条件。

(二十三) 完全正确，我們已經沒有这样情况和条件。有些人怕商品，无非是怕資本主义，不了解排除了資本家，可以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我們是商品生产还落后的国家，不如巴西、印度。商品生产不是孤立的，看它和什么联系，同資本主义还是同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联系，就是資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自古有之，历史上叫商朝，就是开始作买卖。殷紂王能文能武，秦始皇、曹操都变成坏人，这是不对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作为社会制度說，在資本主义社会里沒有社会主义制度，但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就存在了。决定商品（生产）的是周围的經濟条件，商品生产是否可以看成为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有用工具呢？我看它是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在干部中可以討論。

(二十四) 有人说，在我国生产資料公有制已經建立，而僱用劳动制度和剝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第十一頁）

(二十四) 把“我国”两字改为“中国”来讀，就十分有味道。

(二十五)……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的集体农庄的形式。（第十一頁）

(二十五)“现今”指一九五二年，革命后的三十五年，我們才九年。

这里提到两种基本形式。人民公社不仅土地机器，而且劳动、种子、其他生产資料也是公社所有，因此产品都归公社所有。不要以为中国农民都是了不起的进步。河南修武县書記考慮宣布全民所有，实行供給制以后，灾荒发生时，国家是否发工資？丰收时，国家把公粮調走，也发不起工資，灾荒、丰收都有苦悶。这是代表农民考慮这个問題。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慮这个問題。我們商品生产应当充分发展，要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要忍耐。战争打了几十年，現在还要忍耐。等台湾解放，搞社会主义建設，也要忍耐，不要希望早胜利。

(二十六)……这是一个特別的、需要单独討論的問題。（第十二頁）

(二十六)斯大林迴避了这个問題，沒有找到办法和适当的形式。（指集体过渡到全民問題。）

(二十七)可見，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貨币經濟”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第十二頁）

(二十七)它的活动不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資料

也是要属于商品的。农业产品是商品，工业产品不是商品，那如何实行交換呢？这一段把“我国”改为“中国”，讀起来就更有兴趣了。

在中国，不仅限于消费品，还有农业生产資料要供应。斯大林不把生产資料卖给农民，赫魯晓夫改了。

(二十八)在原书第十三頁上，毛主席批語如下：

(二十八)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这两个問題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遗留下来的商品生产問題，目的是巩固工农联盟，发展生产。現在有人說，农民的共产主义很旺盛，下一次乡，认为农民了不起，农民快上天了，农民比工人强。这是現象，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光是这一面，还要看到公社的所有制，包括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属公社集体所有。要象河南修武县書記那样，还要发展商品生产，不要昧昧瞇瞇地往前闯。

(二十九)并且我認為，也必須拋棄从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資本論》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显然，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

(范畴)是与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合的。但是現在，当工人阶级不仅沒有被剥夺政权和生产資料，反而掌握着政权和占有生产資料(三十)的时候，还使用这些概念，这就非常奇怪了。(三十一)現在，在我国制度下，說劳动力是商品，說工人被“雇佣”，这真是十分荒謬的，好象占有生产資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一样。……(第十三頁)

(二十九)特別是工业部門的生产資料。

(三十)商品生产要大发展，不是为了利潤，而是为了

农民，为了工农联盟，为了发展生产。

(三十一)特別在整风后。整风反右后，劳动力不是商品了。不是为人民币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劳动力不是商品才解决了。

(三十二)有时人们问，在我国，在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法则是不是存在，是不是发生作用呢？

(第十四頁)

(三十二)价值法則不起調節作用，計劃、政治挂帅起調節作用。

(三十三)……在我国的制度下，价值法則不会起生产調節者的作用。(第十六頁)

(三十三)在我們社会里，价值法則不起調節作用，即不起决定作用，对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計劃，如生猪、鋼鐵，不用价值法則調節，是靠計劃。

注 釋

①本文第一、二、三、四段是对全书的批語。后面是分章分篇的逐条批語。批語前摘引斯大林原文是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三八年一月第三版译本，标明頁碼，以便检查对照，更好地领会毛主席的批語。

——翻印者

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社会主义部分) (第三版)的筆記

(一九六〇年)

第一部分 (从20章到23章)

一、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教科书p.327—328頁上說：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代替资本主义，而且要用“革命手段”。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的冲突“达到了空前尖銳的程度”。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这些說法都很好，是應該这样說的。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欢。說是客观必然性，就是說它不依人們的意志为轉移，不管你贊成不贊成，它总是要来的。

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很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水平比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无产阶级要“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資本主义”，(327頁)这个說法对，但是在这里还應該說到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遇不到現成的社会主义經濟形式”，